

解决“马太效应”才能拯救欧元

陈东海

对目前欧元区的危机,不少人将矛头直指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认为三大评级机构是肇事的“坏孩子”,是他们挑起和加深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从时间点上来看,欧洲债务危机确实与三大评级机构有脱不开的关系。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于是希腊债务问题正式开始爆发。

但是,实际上三大评级机构至多只是那个不懂“政治”、不懂“商人”脸色的“傻孩子”,只是如实地说出了希腊没有“穿衣服”的真相而已。对希腊债务问题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信心导致的流动性问题,欧盟和IMF于是为其提供援助,后来发现希腊危机在加深,根源在于希腊的单独财政决策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匹配,就逐步要求希腊进行财政重组。但是希腊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预期和规划其退出欧元区人越来越多。现在不光是希腊,连法国都不能自保了,1月13日,标普发表声明下调了16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

在标普的评级系列里,只剩下德国一家还具有稳定的AAA级评级展望。虽然斯洛伐克的评级展望也为稳定,但是标普给它的评级为A。标普

在评级上,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敢为天下先,比如首次把美国的评级从AAA级宝座给拉了下来,所以可能未来不久穆迪和惠誉也会下调法国等国家的评级。因为虽然在标普之后穆迪和惠誉没有下调美国的评级,那是因为他们美国国债已成世界主要避险资产,其收益率后来还在下降,但是最近法国拍卖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升,债务危机日益临近,所以法国等国可能难以获得美国那种待遇。

这样看来,未来真正可能幸免的就是德国了。表面上看,德国的例外是由于德国人勤俭、节省、积极工作不贪图享乐,所以德国的财政问题健康,因此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实际上,德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有多年超过了3%的欧盟警戒线,甚至德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也超过了80%,远高于欧盟的60%的警戒线,比法国、西班牙甚至爱尔兰还高。德国唯一能够幸免并被全球视为安全区,原因在于德国的经济在欧元区里是最好的,前景也是最好的。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为了对付债务危机实行紧缩财政以后,不少欧元区国家经济负增长,但是德国的GDP还在稳健地增长。2011年,德国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5.01%、2.96%、2.52%、3.00%,而希

腊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希腊经济已经连续6个季度同比负增长。所以,希腊的债务比例一直在上升,即使是希腊的债务减记50%,希腊未来偿还债务希望还是很小。

从上述情况看,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区和欧盟内发生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即“马太效应”。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债务危机爆发后,在欧元区创立之初,德国是欧元区国家里效率最高的,当时普遍认为其他国家在欧元区形成之后,会逐步追赶上德国,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德国效率提升超过50%,但意大利、希腊等国效率反而下降。欧元区成立以后,没有发挥协同的进步效应,只是验证了“马太效应”。

其实道理很好理解。那些创新能力不足的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以后,只是在福利问题上向德国等国家看齐,甚至民众享受超过了德国,但是经济上并没有赶上,所以必然靠借别人的钱和子孙的钱搞过度福利,弄得债台高筑。原因在于,加入欧元区以后,欧元汇率和欧元区经济对外界来说,实际上是加总后平均的东西,原来的马克强,其他国家的货币弱,那么大家都进入欧元区以后,由于加总平均的效应,在德国的欧元相对于马克贬值了,而在其他国家的欧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升值了。德国竞争力增强了,

其他国家则下降了。欧元区内部的贸易不平衡,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成为了马太效应的动力。当然不平衡发展到极点,必然反噬德国,也会造成德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受到抑制。

因此,欧元区能否自救关键在于是否能解决马太效应。紧缩财政、财政联盟、发行共同债券,扩大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等,都是拖延之计,无法解决马太效应。因为欧元对于德国来说永远是便宜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永远都是昂贵的,只要继续使用欧元,区内国家就必然受制于这种马太效应,除德国外,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经济发展的前景在哪里,只能是步步退缩。

解决马太效应,是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根本,而这又需要废弃欧元区才有希望。因为退出或者废弃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后,除了德国之外的国家的货币汇率才会与其经济相匹配,其经济才会得到发展的生机,才会从根本上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而德国货币汇率回到均衡水平后,才能导致经济不再依靠出口,经济脆弱性才能解决,在经济平衡发展以后,也才不需要对于其他国家进行救助,德国国民也不会为此分裂。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

焦点评论

元来如此 | Xiao Guoyuan's Column |

抗通胀困难重重 防通胀乃上上策



肖国元

2009年以来,物价高企,百物腾贵。连续上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令底层民众的收入相形见绌,低收入者感受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我们听到了“让收入跑赢通胀”的呼声,值得注意的是,“让收入跑赢通胀”不是一个普泛的议题,而是针对低收入底层民众的。当然,作为对抗通胀的愿望,这样的呼声合情合理,但若想化愿景为现实,则远不是那么能让人淡定的。

一般而言,通胀是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的现象。换句话说,这样的价格上涨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某种商品上,而是涉及大范围、长时间、几乎所有的商品。因此,通常而言,一旦通胀爆发,其对社会的影响是持续的、普遍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也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都难以逃脱通胀的淫威。

但是,由于通胀源于货币投放,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有如波浪之扩散,逐渐影响不同行业的产品,波及与之对应的民众。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商品、不同人群,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受到的冲击与影响也会呈现出差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通胀来临,有些人几乎被高企的物价压得气喘吁吁,而另一些人则对物价的上涨几乎没有感觉。这种反差正好说明了通胀影响的多面性,也为治理通胀,降低通胀的杀伤力铺垫了理论基础。也因此,西方国家往往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应对通胀的冲击:一是实施收入指数化政策,将收入与物价水平挂钩,让工资收入随CPI浮动,以制度性的灵活机制保障基本生活不因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二是对低收入者实行价格补贴,以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的影响;三是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实施价格管制,或固定价格,或限制涨价幅度。

就中国而言,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通胀的发生、发展及其对民生的影响有着自己的特点。具体而言,在中国,收入指数化的机制并

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健全;价格管制虽然并不少见,但能够帮助低收入者应对通胀的却并不多。因此,要达到“不让通胀影响民众生活”的目标并不容易。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改革而来的不对称性变化也与日俱增。具体表现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改革虽然没有停步,但市场化改革在深度与广度上明显遇到阻力,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回归计划体制、遵守计划模式的逆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受阻,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逐渐增大,加深了市场化改革中的矛盾冲突。诸如此类,使得通胀的局面更加复杂诡异,让低收入者的“收入跑赢通胀”之路障碍重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量低端劳动力丧失提高收入、应对通胀的能力。我们知道,通胀时期,包括投入品、消费品、服务等在内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当然,人工成本也会上涨。但各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取决于各自的供给弹性。一般而言,供给弹性大的,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小;供给弹性小的,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大。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针对需求的增加,供给能及时满足的潜力。相比较物资商品而言,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供给充足的市场,虽然理论界早已警告“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但至今还没到显山露水的地步。仅此,即使其他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受制于充分供给的情势,劳动力价格也没有太大的上涨空间。这是收入难以跑赢通胀的第一个障碍。

其二,通胀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经济现象,反映了经济处在不正常状态。通胀最大的危害是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降低企业经营效率。因此,从物价由通胀状态回归到正常水平的全过程来看,企业的经营与相应的效益也被切割成两块:在通胀到达顶点之前,投资增加,效益提高,工人的收入也会增加。而在通胀拐头之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工人收入下降;甚至出现大批厂家破产、失业队伍扩大、工人收入进一步下降的情形。因此,从整个过程看,之前因通胀而来的收入的增加会被之后的收入减少所对冲。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胀时期人们所享受的经济福利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通胀对经济的损害是全方位的。社会各个阶层都要为这种扭曲埋单。作为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其经济福利所

受到的影响更大。

其三,中国的经济中,政府主导与国家垄断的成分不容小觑。这样一种行政干预经济、国有经济凭借政策优势垄断资源性行业的做法赋予不同经济实体以天然的不同势能,将不同企业置于天壤之别的处境中。完全市场化的企业没有政策照顾,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信贷相助,生下来就靠自己;而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等,躺在政府的襁褓中,备受呵护,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且享有政策优势。前提条件的巨大反差会严重影响它们的行为取向。前者会谨慎应对通胀,压缩规模,裁减人员,降低工资水平,以求度过危机。而后者由于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取额外的资源与利益,在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议价权,与此有关的收入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即使处在同样的通

胀形势之下,不同的企业所受到的冲击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的劳动者所受到的牵连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影响的不对称不是缘于公开的市场竞争,而是缘于人为的制度前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影响的不对称显示出通胀的不良后果大多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与底层民众承担了。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的重要原因。

因此,无论从通胀管理入手,还是从通胀本身对经济的损害来看,我们都没有办法使得低收入者的收入能跑赢通胀;其次,无论从损失补偿来看,还是从经济福利增加来看,我们也不可能使得低收入者在通胀时期能独善其身。而且,对全社会而言,通胀带来的是净损失。因此,要摆脱通胀的困扰,使底层民众的收入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阻止通胀发生。



实名购票初衷好,百姓高兴有点早。那厢订票难到手,这边上车不买票。内鬼收钱开后门,黄牛揽客吃夜草。惠民新政欠周密,铁道部门当检讨。

唐志顺/图 孙勇/诗

市场究竟是为谁服务的

李斌

一直以来,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流行着诸多谬见,其中尤为甚者,是说市场会造成贫富分化,因而,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限制市场的力量,加强政府的管制。这种观念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而且也埋藏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心中。这些经济学家尤其喜欢在富人聚集的地方宣讲市场经济,并且愿意“勇敢”替富人讲话。与一般民众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一般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呼吁民众要对贫富分化现象予以忍耐,他们说,这是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要计划经济的大锅饭,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理解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式。不夸张地说,这种论调可真有一些宿命论的味道。

市场经济是一种兼顾平等与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且,相对于其他制度安排,在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促进社会平等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一点,一些人的认识相当薄弱。“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任何人,不问他是谁,都可以平等参与商业活动,来去自由,不受限制。这种开放式的、时时处处都在无休止地发挥作用的竞争活动,既会在盛行平均主义的地方制造差异,也会在差异林立的社会中抹平差异、摧毁特权。市场力量就像无形的水,它不停地从高处向低处流淌,试图把一切存在物推向同一个水平面(市场消除人际差距的力量有时是那样强大,以致一些现代思想家忧心它所造成的均一和单调)。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历史上,市场经济曾经是摧毁专制特权的主要力量,而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捍卫人民大众利益的盾牌来予以推崇的。市场是人民(当然也包括富人)的,是群众的,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维护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福祉之所系。在我国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以及处于全球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当下,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以“为富人说话”的方式来“捍卫”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给市场经济抹黑,客观上也在阻碍市场观念的传播。这里的智识浅薄与逻辑混乱无论如何批驳都不为过。既然这些经济学家也宣称市场是有益于全体人民的,可他们为什么只选择在富人聚会的时候才讲这些话呢?他们为什么不到普通群众中间来表明他们的观点呢?

显然,他们私下里肯定认为,市场在惠及全民的同时,实际上更加偏向于使富人获益;至于普通大众获得的利益,即使存在,也要少一些。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在默认,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剥削——而这是与他们奉行的“生流经济学观点”相矛盾的。其次,这些经济学家一般持有这样一种“现代观点”,即鉴于富人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他们致富之后,就需要予以特别的保护,以免于“多数人的暴政”。固然,在一个不尊重人权的体制下,富人难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在私人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也即在古今未来的大部分社会形态中,富人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并受到优待。财富精英往往与政治精英和其他社会上层力量相勾结,以便鱼肉人民,使其优势地位得以永久化。并且,恰恰由于精英阶层在人数上较少,所以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反之,因为普通大众人数庞大,也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往往会被“各个击破”。这才是一个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这一点被这些天真的学者们忽视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利益集团的势力目前正在我国社会中日益上升。

一个人发家致富之后,可以从任何事业,不一定乐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即使他的财富来自于公平竞争,他也可能设法免于再次承受竞争的压力;即使他拥护竞争,也未必愿意继续拥护“公平”二字。应当说,没有人比普通大众更应当热爱公平竞争了。至少,没有理由认为,富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意图,会比穷人更强烈。这一点,“劳奴”和股民应当有最为深切的体会。目前,一切“识得人间烟火”的人士都应当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差距及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单位之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的性质、类型与程度,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处于优先地位的应当是,通过“开闸放水”也即全面彻底地引入“自由竞争”这股活水来对之予以根本性的治理。然而,现实情况是,各类利益集团借“市场失灵”向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管制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既然西方经济体中存在着很多政府管制条例,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当然”就应当实行更多的管制。在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下的条件下,对过度管制所造成的不均衡,又通过更进一步的政府管制来予以调节,这只不过是一种“错上加错”。

以宿命论的语调来阐释贫富差距的做法,还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动和不断发展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市场经济已经显著区别于古典时代,而变得日益人性和理性化。以辩护性的口吻来论述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在潜在地认定贫富分化现象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普遍的和无法改变的特征。换个说法,假如有人承认某些财富的获得是不公平的,也即让人指控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环境污染的“负的外部性”,那么,这些经济学家其实是在告诉他,搞工业就会产生污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是不会致力于开发绿色适用技术的,也不会致力于制度创新。

这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人类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视作不断地把平等与效率相协调的历史。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不胜枚举。例如,禁止以建立人身依附关系为途径来求取债务的法律,难道不是同时增进了平等和效率吗?——否则,也许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奴隶社会之中。古代的科举制和当今的义务教育制度使得无数出身贫寒的子弟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谁能否定这些制度的伟大意义呢?我们通常总是在反对或赞同美国式自由民主这个议题上争来争去,可是,我们所忽视的“美国精神”的另一面是,美国人民总是敢于审视、怀疑、打破、构思、创造和尝试各种各样的具体制度,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创造活动赋予美国社会以巨大的活力。一些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现代学者们,早在许多年前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正义”这个词语其基本上可以作为“效率”的代名词。

把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犹如研究不同商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不过是所谓“生流经济学”的机械论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分析这个问题的能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蹩脚的经济学既不知道“制度”是什么,也不知道“创新”是什么,又怎么会考虑“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呢?

为了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重新认识,我们需要对经济学进行“推倒重来”。所幸的是,关于这一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开端(参阅“算法经济学—统一社会科学”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bin/>)。现在,在这个统一的“算法框架”之下,我们可以着手尝试对以上所涉及的所有议题来展开综合的、科学的分析与解答。